

ZHEN SHI YU WU XIAN

真实与无限



MR. XIAO YING

肖 鹰

中国工人出版社

WUXIANZHENSHIYUWUXIANZHENSHIYUWUXIANZHENSHIYUWUXIANZHENSHIYUWUXIANZHENSHIYU

ZHENSHI YU WUXIAN ZHENSHI YU WUXIAN

ZHENSHI
YU
WUXIAN

真实与无限

肖 鹰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与无限/肖鹰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8
(魁星文丛)

ISBN 7-5008-2733-4

I. 真… II. 肖…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102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7.625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言：当代文学史观的哲学自觉	1
观点概要	10

第一章 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性与批判：经典现实主义	26
文艺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美学化	31
典型：集体化的理想个性	38
典型化手法与民族化风格的结合	46
现实主义与史诗	52
“非主流”的现实主义	60

第二章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上）

美学与现代性	70
美、情、性的神化与解魅	76
自我意识与新诗潮	82
突入世界的“朦胧”	88
走向无限：自由与无意识	94
面对虚无：反讽与变异	104
传统与现代：寻根之梦	109

第三章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下）

形式主义诗学与先锋运动	118
意识流：时间、语言	124
叙事游戏与自我的可能	133
无限欲望与诗歌的危机	143
自律的溃败和“现实”的艳丽回归	152

第四章 写作与市场化生存

市场与“后现代”：当前个人的生存境遇（1）	160
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悖论：当前个人 的生存境遇（2）	166
现实的散失和欲望化的想象	171
个人化、身体与女性写作	178
解构主义：语言与虚构	183
世俗化时代的诗歌/世纪末的诗歌论争	188

第五章 真实的可能与历史感的重建

个人：在无历史的瞬间	200
向历史的自我生成	206
性别/躯体与历史	211
历史与大地的循环	218
进入历史与真实的可能	227
结 语	232
后 记	236

引言：当代文学史观的哲学自觉

1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对当代文学作历史研究的时候，很难把文学创作和政治运动分开来看，相反，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治运动规定的基本背景上来看待当代文学。由此，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形成了政治决定文学的一元性文学史观，即以时代的政治属性决定文学的价值。这种当代文学史观，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到90年代都占据主导地位。无可否认，政治决定论的一元化文学史观产生了长期困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症结：其一，从政治出发对文学作品简单抽象，即削足适履的处理；其二，陷入是非对立的价值纠缠。

进入90年代，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突破政治一元性文学史观及其叙述模式，其典型表现是：在传统的一元化叙述模式之外，增加一个新的叙述元素，以形成二元性的叙述模式。这就是以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对立，或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的对立为基本叙述结构的文学史写作。这个二元性的叙述模式为许多长期被一元化叙述模式忽视、压抑的作家、作品开拓了叙述空间。二元性的叙述致力追求克服“非左即右”一元性偏执的叙述公正，从而更真实客观地建构当代文学史。无疑新的叙述模式对开拓和深化当代文学史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肯定这个努力和它实际达到的效果。但是，二元性的叙述模式难以避免新的问题：第一，它对公正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实现了价值悬置（游逸）——叙述的非价值化；第二，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它为了维护叙述的二元结构，总是不自觉地强化、扩大当代文学运动的二元对立，使之主题化。叙述的非价值化使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描述”压倒了解释，所叙述的作家、作品都被不自觉地局限在现象的层面，作为单纯的现象被列示；二元对立的主题化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表现出对历史的当下化的虚构——以当下的社会精神重构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二元性叙述的问题集中在对前 30 年文学的评价和解释。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二元性叙述重新发掘和披露了大量被忽视、压抑的作家、作品，提示充分考虑前 30 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当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是否真正构成了主流与非主流二元对立？或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呢？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否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就可以被划为“非主流写作”？赵树理、周立波在 50 年代的作品，无疑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含有民间文化元素，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是否形成了表层的政治形态写作和隐形的民间形态写作的双重对立呢？恐怕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感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二元性叙述是为了突破一元性叙述而建立的。但是，二元性叙述与一元性叙述同样以二元对立为前提。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后者坚持一元价值原则，在其中，二元对立是排斥性的、历史性的；前者则主张价值中立，在其中，二元对立是并生性的、共时性的。二元性叙述没有放弃二元对立

的前提，因此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一元性叙述的抽象性和虚构性局限。

2

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困境提出了审视和重建当代文学史观的要求。现有当代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少哲学的自觉。甚至可以说，哲学作为历史叙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次，却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叙述中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了。

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因为诗是按照应有的原则创造的。这个思想揭示了文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对哲学与文学统一性的自觉使西方文学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始终在哲学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进入 20 世纪以后，尽管哲学本身由于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困境而面临根本性的危机，但文学与哲学的统一性却被空前地强化了。不仅有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具有浪漫主义趋向的现代主义哲学家把哲学与文学（诗）的统一性作为他们的哲学前提，而且甚至如罗兰·巴特、德里达、列奥塔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在解构哲学体制的同时把文学文本哲学化。列奥塔在他著名的《后现代状态》中就明确宣称：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叙事危机使每一个作家在写作中承担着哲学家的工作——文学创作哲学化。没有相当的现代哲学素养和高度的哲学自觉，是不可能解读含有丰富哲学原创意识的现代西方文学文本的。正因为如此，20 世纪西方文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乃至文论与哲学的界限再次被消解。

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同样以文学与哲学的统一性为基础。无论儒家或道家，都把对天地自然的根本意识作为

文学的前提和终极意义。鲁迅称曹丕的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扩大地讲，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论体系确立的时期。曹丕（《典论·论文》）之外，主导这个时期文论建设的代表人物还有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曹丕诸人文论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魏晋文学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来自于魏晋哲学的发达。准确地讲，正是魏晋玄学思潮为文论体系化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思维方式。王瑶先生就明确指出，《论文》中的文气说来自汉末的元气说世界观，《文赋》和《文心雕龙》则是魏晋玄学思想表现于文学上的理论。刘勰是以儒家文学观为本的，但他的阐述方式和精神意气却又是以道家为宗的玄学化的。《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是说明，万物都是原于道，是道的表现，文也原于道，是道的表现。

中西文学史应当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基本事实：文学思想的发展始终是以一定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前提的，开创性的文论家都以特有的哲学自觉为其文论思想建设的基础。换言之，没有哲学的自觉，就没有真正的文论建设和发展。所谓“真正的文论”，是指有生命、有力量的文论。文论的基本功能是总结和阐发即有文学创作，开拓未来文学发展的空间。哲学的自觉对于文论建设之所以是必须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文学与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据我理解，两者的内在联系可以概括为：哲学是文学的深层动机和元素，一切文学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统一于哲学的；反之，文学是哲学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哲学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因此，文论要达到对文学的本质性把握，必须以相应的哲学自觉为前

提。比如说，大家都感到了中西传统文学的深刻差异，但差异究竟是什么？根源何在？如果不深入到中西特有的宇宙、生命意识，是不能把握究竟的。一度流行文论界的“中国重表现说，西方重再现说”，就是缺少中西哲学自觉的皮象之见。

文学史的研究是对一定时期文学创作的历史性的整体考察和把握，是文论的具体展开。文学史研究如果没有应有的哲学自觉，必然使它的史学观缺少最基本的层次，而不能把文学创作的研究引向深入和达到真正的整体把握。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观的建构中，倡导哲学的自觉，以期在哲学与文学统一的深层来把握当代文学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3

现在我们应当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哲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作用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地考察和分析哲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探讨当代文学发展、变化中的深层的哲学意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革命文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掌握和运用它的基本原理、方法从事创作。遵循这个规定，前30年当代文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典型手法相结合的指导性原则，以及相应的创作模式。正如以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为目标，建设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那么通过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英雄）的塑造把个体存在纳入集体运动中，就成为当时文学的基本主题。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具体创作中，这个基

本主题的展开无疑会有差异、变化、矛盾和冲突，但是集体性、理想性和进步观念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与当时的政治意识相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哲学问题就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文学的则是一个规律性发展的，而且通过革命必将高度完善、合理化的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中，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最终将被解决。当代文学创作被要求遵循典型化原则，固然有配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原因，但根本的是由这种理想化的整体性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世界观作为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那么当代文学典型化原则是不可能成立的。前30年中国政治对当代文学的严格控制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就是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不仅是自觉坚持，而且是不自觉运用的创作前提），它从根本上规定了文学创作。

新时期文学的产生是以当代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思想解放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学的政治化的统治被放松或解除了。思想解放的根本是哲学观念的解放。随着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开禁，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文化、哲学观念涌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手法。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纷纭，观念繁多，其冲突、矛盾之复杂，实难概括。但是，由此可以证明的是，统一的理性化的西方世界观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式的世界意识。这个世界意识向个体提供的是自我的孤独和有限性，世界的分裂和无限性。表现到文学创作中，则是非理性、无意识、感性冲动成为写作的主题。新时期文学也同样充满差异和矛盾，就表现形态而言，可以看到革命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思潮的冲突。但是，改革开放已经把一个无限

的、却又缺少内在确定性、统一性的世界展现给了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个人不得不感到深刻的孤独和无奈。这是走向世界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写作的基本前提和背景。在这个基本背景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技术和存在的关系、无限欲望和自我认同的关系，成为文学叙述的矛盾性前提和基本问题。由于世界确定性的消解和无限性的展开，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都聚集到个体存在中，变成了基本而日常的存在问题。这迫使新时期文学丧失了哲学前提的先天确定性，不得不如现代西方作家一样在文学创作中直接面对哲学问题，使写作哲学化。新时期文学的流变、矛盾、冲突，都只能在这个背景上才能展开，并因此才能得到深刻的阐释。

从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考察可以看到，哲学不只在一般的或自然然的意义上影响、作用于当代文学，而且由于当代特殊的政治、社会运动而对当代文学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在前30年，哲学的强制性和直接性来自于时代政治的统一化要求；新时期以来，恰恰是这种政治的统一化要求解除后，社会现代运动导致的个体化存在的发展形成了哲学的新的强制性和直接性：文学失去了先在的普遍的哲学前提，写作被迫寻找自我的基础，因而被迫哲学化。因此，如果不深入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哲学层面，不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作为基本工具，那么进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特性极不相称的，势必困难重重。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哲学自觉，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清理并熟悉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哲学观念、哲学思潮。第二，探讨并把握真正构成当代文学创作深层模式的宇宙、生命意识。无疑，第二个层次是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

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元性叙述简化、平面化了这个深

层模式，二元性叙述则放弃或回避了这个深层模式。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把前30年写作划分为主流与非主流或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两种写作的对立，并以此构建当代文学史，的确是有大量的经验材料做依据的，而且事实上也推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但是，这种二元划分和叙述模式，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前30年中，所谓非主流写作，或民间文化形态写作，是否超越或放弃了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因此，我认为，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归入非主流写作，或认定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包含了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峙的民间文化形态，是简化而不是深化了问题。进一步讲，这种二分法似乎还没有摆脱当时的政治批判强加于这些作品的政治时代色彩，当然价值准则对换了，当时被否定的作品现在却获得了肯定的价值，当时被肯定的作品现在却被否定或被置疑。

我们已看到，当代文学史研究不断在拓展视野，向纵深掘进，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具有深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经成为发展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共识。对文学的社会历史层面、文化层面的关注和开拓，是这种共识的积极产物。历史和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语境，它超越政治、经济的有限性为文学提供深广的话语资源和生活情态。但是，历史和文化对文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深层模式。这个更深的层次就是历史和文化结晶为哲学的层次。因此哲学是文学创作的深刻而丰富的本源，而不是抽象的观念或僵死的教条。我们呼吁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哲学自觉，就是呼吁对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和叙述进入到这个深刻而丰富的本源。在这里，二元对立是不具有终极意义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是奠定文学内在基础的宇宙和生命意识。凭借这个哲学自

觉，我们对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或可摆脱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困境，深入阐释当代文学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生命？

观点概要

1. 个体与集体

中国当代文学，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由中国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决定的。在这里，所谓“决定”有两重含义：第一，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对此前的解放区文学的自然继承和发展；第二，服从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对文学基本的政治和政策要求。与此相应，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并鼓动这场革命，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个基本背景，决定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成为这个时期的基本问题。

在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通常指在 19 世纪欧洲文学中，特别是法国小说中形成的一种文学流派及其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小说的独特功能不是逃避或幻想，而是展示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以追求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核心，现实主义形成了三个基本特点：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实关怀、以科学——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典型化手法，以及建立在这两个特点之上的现实批判精神。

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本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价值的着眼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意味着

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地再现”。这个定义指出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两个方面：细节的真实和典型的真实。恩格斯认为，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能实现文学的真实性，也才能实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但是，因为以真实性为着眼点，他特别强调细节真实的基础性和必要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准备时期的文学理论。这个理论着眼于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命，所以认同普遍的现实主义原则。

当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阶段进入到实践阶段，特别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文学的使命相应地就要发生转换，即要把重心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转换到歌颂和展望社会主义远景。因此，在理论上给予现实主义概念以“社会主义的”限定，在实践上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政策需要规范和领导文学创作，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文艺政策。如果说，在理论准备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眼于发挥文艺（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革命作用，那么，在具体实践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着眼于文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整体内部的从属作用。在此意义上，前苏联作协把“现实主义”限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质上肯定这个限定，并确立了它在新中国文艺中的纲领性地位。

以“社会主义”限定“现实主义”，包含着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两个相统一的转化：一、文艺的政治化；二、政治的美学化。文艺的政治化，即指把文艺纳入政治体制内，文艺从题材、主题到手法、形式都必须遵循政治的要求，为政治需要服务。政治的美学化，即指政治以理想化的形态通过文艺形象（形式）

的途径来表现、实施。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政治美学化有双重目标：第一，把社会主义的远景（理想）转化为文艺形象（典型），给广大群众以直观感性的教育；第二，这个转化的具体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内容和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的紧密结合。怎样实现政治美学化的双重目标，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心内容。这个中心内容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民族性，并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直接统一。以政治性统一真实性，再以统一了真实性的政治性统一艺术性，这是文艺政治化和政治美学化的终点。

通过对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限定，即通过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文艺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中国当代文学被限定在两个基点上发展：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和以民间形式为基础的民族化风格。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的政治意义在于典型形象不仅更强烈、更集中地表现着某类人物的“类的特征”，而且它代表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在批判现实主义中，典型是各类人物的“类的代表”；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典型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代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性”即“理想性”。在这个时期，典型不仅具有广大群众应当学习的榜样的一般意义，而且具有代表和表达集体中心意志的特殊意义。准确地讲，写典型与写民俗的结合，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独特道路。作为对写政治的配合，写民俗也相应地模式化、概念化，它在为作品提供一种民间生活气息的同时，也切断了文学深入当代生活现实土壤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前提下，中国当代文学被纳入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与以民间形式为基础的民族化风格结合的单一创作模式中。这个创作模式是以高度公有化的社会主义远景政治的美